

· 历史研究 ·

## 莫理循《中国风情》一书中所反应的清末西南社会

尚季芳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 甘肃兰州 730070)

**摘要:** 1894年2月至5月,澳大利亚人莫理循在中国西南进行了长达三个月的旅行,著成《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中译本名为《中国风情》)一书,引起西方社会的关注。该书从客观的视角,真实地记录了晚清四川和云南两省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军事状况,诸如鸦片的普遍种植、官吏的颀预腐败、乡土社会的凋敝、边疆军备的废弛、传教士和外籍人士在西南的事工、民众对现代化设施的破坏等等。莫理循还在书中提出诸多发人深省的问题,对认识晚清西南社会乃至中国社会都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 莫理循;清末西南社会;《中国风情》

**中图分类号:** K25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8505(2008)06-0050-04

## Southwest Society in Late Qing Dynasty Described in Chinese Local Customs by Morrison

SHANG Ji-fa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Abstract:** Australian Morrison traveled in southwest China from February to May in 1894, and then published a book *An Australian in China*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Local Customs*), which aroused a great concern in western countries. The book records authentically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military conditions in both Sichuan and Yunnan provinces in late Qing Dynasty. It covers wide opium plantation, office holder depravity, business languishing, national defense abandonment, foreign missionary's activities, and mass destroy to modern facilities, which call for deep thought and help us to know the southwest society and the whole country in that era.

**Key words:** Morrison; southwest society in late Qing Dynasty; Chinese Local Customs

莫理循 1862年生于英属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季隆城,1879年进入墨尔本大学攻读医学,1885年转入苏格兰爱丁堡大学继续学医,1887年毕业并获医学博士学位。莫理循一生嗜爱旅游,1894年2月至5月,他在中国西南地区作了一次长途旅行考察。从上海出发,沿长江西行,经武汉、重庆、宜宾、昭通、昆明,最后到达缅甸首都仰光,行程3000多英里。在这次旅行中,他把观感写成《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一书。在该书中,作者以客观详实的笔触描写了四川和云南两省的诸多社会面相,是一部认识晚清西南社会的重要历史资料。

鸦片是滋生在近代中国社会肌体上的一大毒瘤,给中国社会的正常行进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西南作为近代中国最大的毒品生产地,鸦片烟毒的泛滥对地方社会的影响巨大。莫理循游历西南之时,正是清政府统治权威急剧衰落、地方失

控现象渐次显现的时刻。社会各阶层都将鸦片作为谋利的主要手段,以至鸦片成为西南各省的重要财政支柱。种植、吸食和贩运鸦片猖獗不已。

莫理循看到,西南只要有适合鸦片种植的地区,无一处无此物,“从湖北到缅甸边境长达1700英里的旅程中,我一路上都能看到罂粟”。<sup>[1]45</sup>重庆到水富沿途“罂粟很多,并受到精心的照料”;<sup>[1]56</sup>水富到昭通的路上,“罂粟花盛开着白花”;<sup>[1]77</sup>昭通到东川的大路上,“河岸上长满了盛开的罂粟花”;<sup>[1]118</sup>楚雄到大理之间,“我们再次在满地罂粟的地区中前进,山间河谷都闪烁着各种颜色的罂粟花”;<sup>[1]184</sup>总之,西南“每块能利用上的土地、大路两旁,都种上了鸦片”。<sup>[1]187</sup>

罂粟的大量种植,其成品首先被销往外地,赚取巨额利润。每年鸦片收割之际,外地烟贩成群涌入西南各省,收购生鸦片。作者在大理看到:“鸦片收割季节,大量广州人来到大

收稿日期:2008-10-20

作者简介:尚季芳(1976-),男,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在站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区域经济史的教学与研究。

理。……他们带着鸦片回广东时,成群结队,成单行——一个跟着一个——走在路上。”<sup>[1]217</sup>仅 1893 年,四川向外销售鸦片 2250 吨,云南 1350 吨,贵州也有 450 吨,三省的总数达到 4050 吨。<sup>[1]47</sup>鸦片的贸易,刺激了地方经济的短暂畸形繁荣,但源源不断的毒品输往外地,残害着无数生灵的性命。

其次,由于鸦片产量大增,价格低廉,加之疾病的困扰和长期苦难生活对老百姓的折磨,使得西南各地的“瘾君子”迅速蔓延增多。重庆人口约为 20 万,但“所有男性中的 40% 到 50%、女性中 4% 到 5%,都沉湎于烟雾缭绕的鸦片烟中”,这里“鸦片烟馆比比皆是”。<sup>[1]44</sup>云南水富县有 18 万人,“由于吸食鸦片的人数太多,因而人们关心的问题不是谁吸鸦片,而是谁不吸鸦片”,<sup>[1]71</sup>整个城区“每家钱行、丝绸商店、商行和其他货店,无论是经营什么商品的,都有吸食鸦片烟的房间。房间里准备好为吸食鸦片者提供的烟灯烟枪。”<sup>[1]72</sup>

更令人痛心的是,由于鸦片销售渠道的广泛以及价格的低廉,那些想结束生命的人便将鸦片作为最好的自杀工具。大理城每年大约有 50 到 60 例服鸦片自杀的事例。<sup>[1]209</sup>

面对这种惨况,莫理循也时发评论,追究其泛滥的根由是英国不正义贸易。<sup>[1]214</sup>但中国官员也难逃其咎。他们本身就是鸦片吸食者,大理知县“是大理城吸食鸦片最厉害的官员,是鸦片烟枪的奴隶,经常忽略他的职责。”<sup>[1]204</sup>同时,“鸦片是四川这个富庶省份的大宗产品,是重庆这个繁华城市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sup>[1]44</sup>所以为官者将此作为维持地方财政运转的主要手段,对禁烟无彻底决心,禁令执行首鼠两端,“禁止吸食鸦片的法令仍然在起草颁布,而这些法令正是由那些嘴中叼着长长的鸦片烟枪的所谓中国慈善家起草的,是由那些不仅吸食鸦片而且其薪水正是取之于罂粟种植税的官员们签署颁布实施的,并且由那些种植鸦片、吸食鸦片的地方行政长官张贴在罂粟种植地的附近”。<sup>[1]47</sup>他进而将矛头直指李鸿章,认为李是“中国最大的罂粟种植者”。<sup>[1]46</sup>显然,西方罪恶的鸦片贸易和中国财政上对鸦片的依赖,官员在禁烟上的暧昧态度,使得鸦片在晚清终无彻底禁绝之日。

## 二

除了遍野盈目的鸦片外,另一个对莫理循留有深刻印象的是西南社会的贫穷落后。积贫积弱是晚清中国社会的表征,西南地区也不例外。作者所经之处,到处可见倒塌的房屋,破败的乡村,成群的乞丐和婴孩的买卖。

坐船上溯重庆时,四川苦力的悲惨深深的触动了莫理循。他写道:“3 天来,我所看到的从我身边走过的纤夫,比起我在中国遇见的其他苦力来说,体格是最孱弱的。这种纤夫中流行着肺结核和疟疾,他们的劳动极端艰苦,他们衣不蔽体,遭受太阳暴晒,他们在半饥半饱的状态中挣扎。”<sup>[1]36-37</sup>进入云南境内,贫穷苦况更是触目皆是。大关县“县城内有 1 万左右人口,可是县城却很破旧,贫穷反映了它的总特点。泥土城墙在破裂,泥土和木料造的房屋也开始塌倒,街道乱糟糟的,居民穿得破破烂烂。”<sup>[1]95</sup>昭通“众多的乞丐从街道上被驱赶出来,被关在南门外带有围墙的寺庙和场地里,依靠大众提供的救济生活”<sup>[1]98</sup>,狭小的生活空间,他们最终染上了严重的流行高

烧,成批地死去,在被驱赶进庙的 5000 乞丐中,有 2000 人未能活着出来。大理在回民起义之前,人口稠密的城郊延伸到下关的半路上,“可是现在却变成了一堆堆碎瓦石。”<sup>[1]200</sup>

鸦片的种植加剧了地方社会的贫穷。昭通长期种植罂粟,“在过去 4 年中,粮食收成非常糟糕”。<sup>[1]38</sup>这里粮食短缺,物价上涨,“在收成较好的一年,1 升大米卖 35 文(不到 1 便士),现在 1 升却达到 110 文;一般情况下,1 升玉米 60 文,现在却是 65 文”,更为严重的是,当地“1 升的重量从 12 斤减少到 5 斤,而与此同时,铜钱与银子的交兑关系从每两银子 1640 文降却到 1250 文”,<sup>[1]39</sup>显然这些都是物价上涨带来的恶果。

为对付贫穷,民众在无奈之际,不得不卖掉或杀死自己的小孩,婴儿的买卖和贩运在云南相当普遍。在昭通地区,1893 年大约“有 3000 多名儿童(主要是女孩,也有几个男孩)被卖给人贩子,然后像篮子里的家禽一样被带到省会城市昆明出卖”。<sup>[1]99</sup>平常年景,一个 5 岁女孩的价格是 5 两银子,10 岁女孩是 10 两,但在饥荒年月,每个女孩的价格降到 1 两到 2 两。该年,在东川地区,“至少 3000 名小孩从昭通经由东川弄到昆明”。<sup>[1]127</sup>在卖婴的同时,杀婴现象也屡见不鲜,莫理循记述道:“杀婴,这种可怕的行为,在遭受饥荒的昭通城非常普遍。”<sup>[1]100</sup>令人震惊的是“死童和还活着的婴儿,通常被抛弃在坟堆之中的公地里。人们经常悲痛地看到狗在那里撕咬”。<sup>[1]100</sup>

在西南各地,贫穷加上缺医少药的困境,地方性疾病十分突出。莫理循在云南期间,经常看到数量众多的甲状腺肿病人,“从昆明到元昌,我所有的日记都是关于这种病例的记录”。<sup>[1]222</sup>在大理到腾冲的路上,“一天下午,一群人从我身边走过,我数了一下,其中有 8 人是‘粗脖子’。另一天,我们刚走下山时,看到一群 9 个人正在爬山,这 9 人全部患有甲状腺肿病。在一个山村里,我骑着马沿着村中街道而过,看到 18 个成人就有 15 人是‘粗脖子’。甲状腺肿病给民众带来了无尽的痛苦,作者写道:“每个人都迟钝、表情麻木、痴呆、或多或少带有甲状腺肿病及随之而来的智力痴呆的特征。”<sup>[1]223</sup>

西南社会的贫穷迹象是晚清整个社会贫困落后的缩影,腐败衰弱的清政府无力给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基因,致使其长期徘徊在停滞破落的局面当中,广大民众只能苟延残喘,在简单的生活样态下聊以度日。

## 三

莫理循旅行西南期间,当地的社会政治和军事状况也是其着眼点较多的一个方面。就政治而言,西南社会不乏一些尽职尽责的官吏,如东川知府“是一个具有卓越才能的开明的官员,他的统治公正无私,……他的虔诚使他深受人民的爱戴,他的忠诚使他得到人民的支持”。<sup>[1]126</sup>然而大多数官员贪污腐化,颟顸敷衍,多不称职。时任四川布政使的关朝元被任命为驻英法等国的全权大臣,但他不愿就任,理由是:“此项任命迫使他离乡背井,到英国,依靠固定的薪水生活,被迫让出大清帝国中最令人垂涎的职位——这个职位带给个人的财富是难以估量的。”<sup>[1]72</sup>昆明市的中方电报总办李平章,年薪 400 两银子,“可他却指望能年积存银子 1 万两至 2 万两”,作者指

出像李平章的这种致富方法是明显的“榨取”。<sup>[1]150</sup>然而即就这样的官员,他除了做昆明市的中方电报总办外,还是云南和贵州两省的电报总办,但是“他对电报知识完全不知,对电报管理制度也完全是门外汉”。<sup>[1]151</sup>莫理循由此批评中国的官员“无所不能”。在重庆海关,他看到该处不存在走私,原因是“海关里面没有中国官员”,进而他有所挖苦的强调,“一旦有中国官员到海关防止走私,人们马上就会考虑如何进行走私。中国的海关搜查员做得很好——他们的眼睛不是用来检查,而是用来如何为自己获取好处”。<sup>[1]137</sup>保卫该海关的炮艇人员,名单上有80人,而实际工作人员只有24人,艇长按名单领发薪水,多余部分尽入私囊。

就军事而言,西南各地普遍军备废弛,军事设施落后。作为云南省最大的军火生产厂——昆明军火厂,质量设备和人事难如人意。比如该厂“熔炉烟囱很短,仅有25英尺高,炼铁的条件非常差”,但官府却禁止提高烟囱高度,原因是碍风水,“如果烟囱加高,昆明就会发生骚动”。在这种景况下,铁的质量很低,枪炮质量极差。生产出的“新产品”,也很少用于实际的防卫当中。昆明城内小西门,按理说应该安放最新由该厂生产的军火设施,但实际安放的是“一些古典式小型铸件的大炮,如果不是原件的话,也是仿照两个世纪以前在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扔下的枪炮制造的”。<sup>[1]173</sup>

由于防卫设施的落后和枪支弹药的缺乏,西南各地要塞形同虚设。莫理循在腾越城见到该地“城墙完好,排列也很整齐,用泥土筑成的堤防宽20英尺,但是我未看见堤防上有任何枪炮,也未在城里或城外看到一个武装的人”。作者取笑道:“从缅甸来的侵略军可以在腾越城周围的高山上安放大炮进行轰击,从中取乐。”<sup>[1]240</sup>而管辖此地的张总兵虽然高大英俊,勇敢无比,“但是对现代军事知识完全无知”。<sup>[1]241</sup>南天镇也是一个军事要塞,要塞里驻扎着400个士兵,但花名册上的数目是1000名,这些士兵的武器“除了各种各样生锈的、原始的前膛枪外再看不见其他枪支。几尊生锈的铁铸大炮,由于长时期埋在泥土里而早已不能再用。要塞里可能有军火,可是看不见。更有可能的是(这种情况更符合于中国人的实际情况),前任指挥官留下来的军火(是否有留下来值得怀疑)早就被现任守备军官卖掉,这自然是他的一笔额外收入”。<sup>[1]245</sup>

莫理循细致地描述了一个护送他的士兵的一支枪,“此种武器的扳机弹簧坏了,因此拉不动扳机;即使扳机弹簧还是好的,也没有子弹供铁锤冲击射出;即使有子弹,也没有用,因为针孔是生锈的;即使针孔是张开的,来福枪仍然没有用,因为枪上没有装弹药,很可能因为没给他备有弹药,即使备有弹药,他也被迫卖掉,换点钱买来吃,因为皇帝忽视应该发给他的狗粮”。<sup>[1]237</sup>西南各地士兵的装备大多如此,其战斗力低下不言而喻。武器的落后,管理者的无能,莫理循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如果他们有一个良好的政府,得到正确的指挥,那么无论在数量、吃苦耐劳及沉着勇敢方面,还是在战斗力方面,都不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可以相比的,他们潜在的力量是巨大的。”可是“他们毫无进步,一成不变,他们看上去是太落后了,他们仍然生活在过去的岁月里”。<sup>[1]264</sup>造成这种局面的根

由是统治者的腐朽没落。他预测道:“中国在不远的将来,会爆发一场危机,一场严重的危机,因为这样一个时期很快就会来到,即:现今统治中国的没落外族王朝——满族王朝——将会被推翻,一个汉人皇帝将会坐在皇位上。”<sup>[1]265</sup>尽管这种预测不甚准确,但清王朝最终被推翻确实应验了他的预言。

#### 四

在《中国风情》中,莫理循对外国人在西南地区的事工也关注较多,包括传教士和各机关中的外籍人士。

西南是近代西方传教士着力布道的主要地区,莫理循所经各主要城镇,都有传教士扎根于此。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传教工作举步维艰。万县教会自1887年成立,截至1894年,只出现了3个有希望的“问道者”。<sup>[1]27</sup>东川新教会创建于1891年,但“迄今为止,还未有一个东川人受到洗礼”。<sup>[1]20</sup>云南省有18个新教传教士,在昆明、昭通、大理等地设有分支机构,昭通有皈依者2名,东川1名,昆明3名,大理3名,昆阳2名。<sup>[1]175</sup>作者反问道:“18个传教士在8年中皈依了11个中国人,那么皈依其余的居民需要多长时间呢?”<sup>[1]176</sup>

原因何在?引用水富大主教莫托特神父的话:“中国人皈依天主教,主要是出自于‘物质利益’的考虑”。<sup>[1]63</sup>事实的确如此,皈依到天主教的信徒大多家庭破落,生活无着,不得已接受了洗礼。有些皈依者也往往因行为不检而被谴责,如巴黎教会昭通分会中一个被认为是最好的基督教徒却在“最近破门而入,任何值钱的东西,都被他偷走了”,共盗走300两银子。<sup>[1]104</sup>昆明教会派出一个最值得信赖的皈依者到蒙自去采购物品,随身带着教会所给的400两银子,但到蒙自后,逃之夭夭。<sup>[1]69</sup>

为了使传教工作进展顺利,传教士努力工作,通过创办学校、开办医院等手段,以赢得当地人的信任。重庆美国卫理公会圣公会教会设有一栋教会医院,“医院里有一间隔离病房是用墙围起来的,专门治疗那些渴望采取强制手段戒绝鸦片的吸烟鬼。我参观这间病房时,有3名鸦片烟鬼正在接受长期的监禁治疗。他们在这里感到幸福、满足,营养也很好。”<sup>[1]40</sup>万县内地会传教士白吉尔在天花横行的日子里,“一旦有人请他,他从不拒绝去护理病人或已奄奄一息的人。他冒着生命危险,拯救了很多居民的生命。”<sup>[1]26</sup>水富教会开办了一个男孩班,收容了50名衣服破烂肮脏的小孩,7名在重庆发现的弃婴(女孩)也寄养在该教会里,她们都是天足,得到了教会的精心哺育和照料。<sup>[1]64,74</sup>东川教会开办了一所收养小女孩的孤儿院,内有几个被父母抛弃的小孩,由天主教修女负责照料。<sup>[1]133</sup>大理传教士史密斯“每到一处,都受到热情欢迎”,原因是当地发生的患病或鸦片自杀事件,都请他去治疗,“而他从未拒绝去给病人看病,无论白天还是晚上”。<sup>[1]209</sup>显然,传教士就是通过以上手段,尽可能使更多的中国人皈依基督教或天主教,达到传教目的。

除传教士之外,西南各地的一些部门有众多的外国人在任职。如主管云南和贵州两省的电报总办克里斯丁·詹森,在受雇于中国政府期间,他为西南的电报业发展做出了贡献。他指导铺设了昆明—贵阳、昆明—蒙自、昆明—腾越的电报

线,后又在缅甸边界与印度的电报系统连接起来。<sup>[1]154</sup>

在西南的外国人不乏一些为侵略者张目的卑劣份子,但也有些为晚清西南社会的进步做出了些许贡献。就以上他们所做的具体事实而言,其推动改造当地社会的努力不容抹杀,开办学校、创办医院、收养弃婴、架设电报线等所取得的成果在客观上或多或少推动着西南社会的发展。

## 五

莫理循笔下的晚清西南社会,以上所述是荦荦大者。在他的视野中,还记述了众多的厘金收税卡,西南地区的生态、民众的重男轻女观念,缠足习俗的普遍,钱币的流通状况,对犯罪者的残酷惩罚,中国医术的落后,中国人的滥吃等等现象。值得指出的是,作为一个外国人,他能站在客观的立场上描述所遇到的社会景象。尽管他对某些中国人的行为深恶痛绝,但他仍认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这里的人奉公守法,兢兢业业,吃苦耐劳,诚实守信。在重庆时,他写道,这里“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了应有的保障,在中国其他大城市也是如此;然而欧洲没有一座城市能够如此”。<sup>[1]144</sup>对雇佣的苦力,他无不称赞,“我的两个苦力属于第一流的小伙子。他们不知疲倦,充满幽默,使人高兴。”<sup>[1]189</sup>对于礼节,“我认为,在我遇到的所有人中,中国人是最有礼貌的。”<sup>[1]193</sup>该书的字里行间都有这些称赞性和客观性的语言。

(上接第 46 页)

无关,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附属性质义是某一事物本质之外的特征。这些特征广泛存在于此类事物之中,但不具有周遍性。

例如“学者”的内在性质义是“在学术上有较高成就的人”,附属性质义则有“儒雅”、“谦和”、“睿智”等特征。但是不是每个学者一定都具备这些特征。“孩子”的内在性质义是指人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阶段,附属性质义则包括了“顽皮”、“任性”、“情绪变化无常”等特点。

“孩子脾气”、“学者风度”等短语,是用定语“孩子”、“学者”等名词的附属性质义代替了内在性质义,表示中心语的属性特征。这种变化还体现在定语的指称也发生了变化:表示领属关系的“孩子”、“学者”是具体的单一指称,表示属性的“孩子”、“学者”指称的是具有“孩子”和“学者”的特点的一类事物,由单指变为泛指。

这一类短语主要用于表示人的性格、精神方面的特征,类似的短语还有“淑女风度”、“骑士精神”、“菩萨心肠”等等。

这种认知——转喻型定语在许多后起短语中被广泛运用,不仅限于描绘人的特征,还可以用于描绘事物特点。尤其当这个特点十分抽象,不便直接描述时,往往选择一个有相似性的具体事物作为定语。例如“泡沫经济”、“朝阳产业”、“灰色收入”、“阳光工资”等。

### (二)名词内涵与外延的转化

生物武器——生物武器 硕士论文——硕士的论文

农民意识——农民的意识 国民待遇——国民的待遇

莫理循也不时对外国人进行猛烈的抨击,纠正西方人对中国的诸多偏见。他批评那些传教士和外国人经常无视中国的历史,经常忽视中国的生活方式、政体、习俗和宗教。对于杀婴行为,他经过对比分析肯定地说:“杀婴的犯罪问题显然比高度文明化的欧洲民族和美国人中非法堕胎的情况少得多。”<sup>[1]129</sup>莫理循看到中国药品商在重庆销售吗啡丸以治疗鸦片瘾,他申斥道:“这种可获取暴利的药品是由海岸港口城市的外国药品商引进而为中国人所采纳的。”<sup>[1]147</sup>在万县口岸,他看到“许多船上飘着外国国旗,这样他们可以免除中国海关的检查”,此地的“税收五花八门,但无论如何,英国海关征收的5%的货物关税都不能免,执行地有时在宜昌,有时在重庆”。<sup>[1]24</sup>文中对外国侵略者的谴责一目了然。

莫理循对西南社会的客观报道,使他在西方社会赢得了声誉,也为他将来长期在中国政府任职打下了基础,同时为我们认识晚清西南社会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历史资料。

### 参考文献:

- [1] [澳]莫理循·中国风情[M].张皓,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

[责任编辑 陈玉兰]

表示领属义的定语使用的是名词概念的外延,“捕猎时,生物(的)武器多种多样,令人叹为观止。”“经济发展了,国民(的)待遇应该提高。”

表示属性义的定语使用的是名词概念的内涵,“生物武器是未来战争发展的新方向。”“外国公民在中国没有权利享受国民待遇。”

##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的”的隐现主要关乎名词定语的领属义和属性义的划分。这里面又有多种复杂情况存在。名词作定语时涉及到“的”的隐现问题,实质上是定语名词的性质问题。定语名词性质的变化、“的”的隐现、短语的语义语用特征,这三个问题息息相关相互作用。前面两个因素共同作用造成了第三个结果。这个作用的过程,与名词性质本身的演变以及人们认知世界和使用语言的方法都有密切关系。

### 参考文献:

- [1] 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下)[M].第四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 [2] 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 [3] 张敏·认知语言学和汉语名词短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 [4] 王野萍·有关名词作定语的几个问题[D].太原:山西大学,2004.

[责任编辑 张安林]